



古今与跨界

——中国文学文化研究

陈建华 

古今与跨界

——中国文学文化研究

陈建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与跨界——中国文学文化研究/陈建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309-09750-4

I. 古… II. 陈… III. 中华文学文化-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1482 号

古今与跨界——中国文学文化研究

陈建华 著

责任编辑/邵 丹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5.5 字数 409 千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750-4/K·429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本书十八篇论文,发表于书刊杂志,尚未结集的,收在这里,藉以反映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兴趣。分几个类目,所谓古今,其实视域未逸出中国,跨界也是立足于文学,以语言诠释学为基础,与文学以外的研究领域寻找对话的可能,其间含有把文化视为人文整体的意思,零零碎碎仿佛在从事一种文化史的建构。对于自己的求学过程以前写过一些回顾文字,这里不必重复,大约觉得这个论文集有点像橱窗陈列,因此不妨对各类文章在学理上的来龙去脉做点交待,必要时讨论些问题,或许能借此识别自己探索的路标而有利于日后努力的方向。

第一辑文章是有关明代文学的。第一二篇作于一九八〇年代后期,自然令我回到那时在已故章培恒先生身边读书的情景。早先做硕士论文也是由他指导,主题关乎晚清文学与革命。这回博士论文以“明代江浙文学”为题,主要处理文学的情感世界,学习章先生的“人性”理论,对我来说不啻是一场“情感教育”的文学史启蒙。除了文本阅读的基本训练之外,他十分重视文学与社会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当时思想界愈趋于活跃,各式思潮从尼采、韦伯到新儒家纷至沓来,而章先生致力于文学史的价值重估工作,却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开出一片源头活水。当时的知识界正拥抱思想解放,对“现代化”表达出强烈的集体诉求,在这样的思想背景里,他所强调的文学“个性”与“自我”,不无特异的色彩。

对于明初文学,章先生较欣赏高启和杨基,说《青丘子歌》颇有“为艺术而艺术”的意思。我曾有过文学青年的梦想,酷爱过波特莱尔,也知道点戈蒂叶“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但听先生这么讲古典文学,觉得观念超前得飞了起来。《明初政治与吴中诗歌的感伤情调》一文描绘了发生在明初的一场文学浩劫,江南地区的文人遭到新朝的整肃,被杀戮、放逐,高启是个要角。元明之际的文集,凡能找到的,一本本研读,面对资料碎片构成的历史场景,

心戚戚焉，历史为何会如此相似？自问中不无困惑。这样的描述无疑具某种政治性，个人的生活经历无疑在其中起了作用，“问题意识”在“诠释循环”中呈现。然而回归人性，充分尊重个性创造与自由，我想是恢复了一条具普世性的真理，这里所谓“普世”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好像专属于外国的，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学史得以开展的基本动力和精神。学术研究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但必须尊重和甄别史料，让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非为了建构另一种意识形态。我至今相信这一点，这是最初受之于章先生的，虽然做不到像他那样一丝不苟。

在明代文学中人性的升降起伏中，李梦阳是个承前启后的诗人。他不属江浙文学，但通过他对于理解文学的地域差异也很重要。先生先是嘱我与之合写一篇李梦阳评传，在研究中从版本、观点到修改，循循善诱，等于手把手地教。评传写就，又嘱我在此基础上做深一步研究，另写成《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一文，由我单独署名在《学术月刊》上发表。后来评传发表，得到的稿费章先生分文不取，全数给了我，叫我去买自己喜欢的书。回想起来我觉得不仅是学问，他的待人之道也不可及。

第三篇《晚明文学“现代性”——杜丽娘“游园惊梦”新解》最初是二〇〇五年夏在南京大学举办的《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研讨会上宣讲的。自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性”这一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胫而走，如李欧梵先生的“现代性追求”脍炙人口，或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是以他的晚清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论述作为依据的，这把我们所习惯的“近代”和“现代”的视域变得宽广起来了。“现代性”有多种理论源头，在人文著作中流通得多了，遂不言自明地认同一些属于“现代”的价值指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一般指受到的西方影响及其在本地的挪用。我的那篇文章试图在中国脉络里与“现代性”对话，或寻找某种现代性的“中国模式”吧。历史中固然不乏与现代价值的相通之处，如果因此追溯“现代性”源起的做法并不足取，而近年来欧美学界把“十七世纪中国”作为研究专题，有的称之为early modern时期，特别重视这一期间里人文领域中的剧烈变革，因为与现代的关系颇为直接之故。《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当然是全剧中最为惊艳的关目，对于杜丽娘在后花园被春光唤醒其欲望的那一刻，我从“现代性”的“自我启蒙”的角度作了寓言式的诠释。她在“后花园”所展开的想象世界里，经历了自我的觉醒、成长及追求过程，其精神之自由能穿透生死、阴阳、真幻的界限，不受时空的限制，意味着中国十七世纪文学与文化已在时间和自我意识方面出现重要转型。这既体现了具普世意义的“现代性”经验，又

蕴涵本土文化的特质。本文揭示这些特质另有两层意思：一是着意于自身文学文化的历史有机性，或有利于“古”、“今”文学关系的认识；二是强调“现代性”理论本身的历史性，或有利于对于历史和理论关系的认识。为了切合“晚明时刻”，该文对于“现代性”理论框架作了一番调适，其实应当更为明确地指出，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论述一般强调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代表的社会 and 科技进步的“硬件”，即如我所批评的黑格尔式的“现代性”理论，像在杜丽娘身上所体现的那种穿透生死、阴阳、真幻而不受时空限制的时间意识，对于“美学现代性”的理论别具意涵。

这篇文章里提到“古今贯通”的主张，是受了当时章先生感召的表示，虽然我这么诠释《牡丹亭》是否有效是另一回事。的确我自二〇〇二年在香港教书，有时回上海谒见先生，他总要问起我在做什么，也总是勉励有加。知道我在做《金瓶梅词话》与视觉文化，或格里菲斯与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他也都叫我给古籍所讲一下。那种开放的态度，使我感动莫名。这本论文集以“古今”为名，也是对先生的一种纪念，近年来我的研究偏重于近现代，但平日教的仍是古典文学，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希望有余力能做进一步探究。

《世界革命语境中的中国“革命”》一文原是英文发表，比早些时写的《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一文补充了关于孙中山的论述，遂与王韬、梁启超组成“三剑客”，使“革命”在晚清的跨文化旅程及其景观显得较为丰富，故收入此集。笔者在《“革命”的现代性》一书中对于“革命”一词经过英语与日语的翻译传播如何在二十世纪初形成长期主宰中国思想与政治的革命意识形态，做了一些考释，但问题还没有完。比方说在孙中山研究中长期流传着有关他早期进行“革命”反清的迷思，大量材料与史实有出入。其中涉及一重公案，是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中回忆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至日本神户，见到当地报纸称他为“革命党”，从此即以“革命党”自称。一九八五年陈德仁与安井三吉合著的《孙文と神戸》一书指出，当年神户的报纸的确报道了孙中山的广州起义，仅把孙叫作“广州暴徒”，没有类似“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之言，因此他们推翻了陈少白的说法。对于这一点，我在书中认为陈少白的说法有问题，但是否就此应当被否定尚须斟酌：“对于陈少白的自述，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在说谎，出自革命宣传的目的；另一种可能是他的记忆有误。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为多，因为我们可发现另一条材料，即在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五月，宫崎滔天将孙中山《伦敦被难记》译成日文，题为《清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九洲日报》连载。这样看来，当时确有日本报纸称‘清国

革命党领袖孙逸仙’，这说明陈少白所说的‘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是有根据的，只是在他的事隔三十余年的回忆中，地点与时间弄错了。”这么说还较为简略，后来在《孙中山何时自称“革命党”？》一文中作了具体考索，此文最初于二〇〇四年在台湾国父纪念馆举办的孙中山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在会上被担任评论的蒋永敬先生称为“杰出”论文，方得知蒋先生原来当年与罗家伦、李云汉一起编写《国父年谱》，是位资深前辈，尽管我在文中把《国父年谱》批评得较厉害，他却表现得很有气度，令人敬佩。

当初研究晚清“革命”一词的翻译旅行，动机是“祛魅”，即将数十年来把我们搞得你死我活的革命还原为一个最初的语言建构的事实。当反清运动愈益高涨时，很少有人具有像梁启超那样的语言敏感，试图将“革命”脱离传统的暴力话语，纳入日常改良的轨道，对这一点我深表同情，遂称之为“‘革命’的现代性”，其中寄托着某种个人的愿景，希望这一“革命”概念能在中国发扬光大。前数日得到董炳月兄惠赐的新著《“同文”的现代转换》，书中指出梁启超等人已经注意到中国古典“革命”话语的多样复杂，试图以“尧舜革命”来取代“汤武革命”，这一点与他们所推崇的“明治维新”在词义上是相通的。炳月兄从我的一条注文加以引申，分析了梁氏的《释革》一文，精彩把握了梁的“尴尬位置”，揭示其一面要消解“政治化、暴力化”的“革命”，同时却欲拒还迎，又造成“革命”的意涵的现代转换。在讨论中炳月兄显出对于革命的暴力问题的人文关怀，这令我感动，虽然涉及其他一些问题，这里难以细述了。

尽管如此，革命的现代性并未完成。无可否认，在现代中国，无论是辛亥、是北伐，还是从湖南农民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革命”的确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其基本意义却仍是政治的，与暴力相始终。在《“革命”的现代性》一书中对于晚清“革命”话语的研究，就时段而言大致勾画了在二十世纪初革命意识形态的形成，就戛然而止。我对“告别革命”的乐观主义不以为然，当然不是为革命招魂，却如难以摆脱的梦魇，因此这几年一头扎进所谓“鸳鸯蝴蝶”文学的研究，大约是一种心理创伤的自疗。但研究现代中国离不开革命，像茅盾那样的作家固不消说，即使是都市通俗文学也被笼罩在革命的阴影之中。二〇一一年值辛亥百年，也是赶浪头吧，放下手头的研究课题，重又接续了晚清“革命”话语的线头，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叩击天朝的世界革命——康有为戊戌奏议与“革命”用语》(World Revolution Knocking at the Heavenly Gate: Kang Youwei and His Use of *Geming* in 1898)，刊登在中国社科院的《中国近代史》英语杂志上，另一文即收入此集

的《辛亥，死活都要“革命”》。题目触眼，本来是文章里的措辞，杂志主编顾昕兄建议放到题目里，却也触到我的心结，为什么要纪念辛亥？想起一本书有题为“拯救历史”字样的，但拯救革命是为了活人，不是死人看的，书写革命须存“救贖”之心，或能从革命拯救历史。一个理论问题是“革命”的使用在多大程度上能决定政治实践？主张“维新”的康梁等人并非彻底的改良主义者，也搞政变、武装暴动乃至暗杀。为他们所鼓吹的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地进行了政治改革，在移植西方文明方面也卓有成效，结果却走上军国主义之途，“维新”也不能保证必定带来文明。

古人不轻言“革命”，因为它像一把双刃剑。历代新朝借助“革命”来加冕其合法性，同时蓄意要防微杜渐，把任何反抗斥为“造反”，枉借天命，为的是稳固自己的统治。然而谁能决定“革命”的合法性？其中天命和人事相辅相成，造成中国历史改朝换代、天命无常的特点。随着帝制的结束，这一游戏规则被打破，从长程历史来看，从孙中山自命为“革命党”到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传统革命话语被颠覆，人人有权革命，然而以“卡里斯马”（英语 *charisma*，“超凡魅力”之意）的政党领袖与群众运动之间的神秘扣联为主轴，而知识分子在边缘与中心之间回旋。《辛亥，死活都要革命》一文追踪这一“革命”话语“由奴入主”的转折，无论革命派或改良派在世界革命风潮的激荡之中，如谭嗣同说：“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等于在鼓动造反了，把他们与“圣人”或华盛顿、拿破仑等量齐观，已经模糊了“革命”和“造反”的界限。同样章太炎等人在惊恐诅咒西方“革命”时，也等于把至尊的“革命”拱手让给了孙中山。这是个有关集体意识的历史谜团，无意中置身于语言的牢笼中。蒋智由的名句“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蕴含着对于“革命”及其“文字”的迷信，也包括对于政党与群众政治的新的视域与想象，却隐含着未来中国的视域。

八十年代后期在复旦读博士的，住在同一个楼，不管读文学、哲学、历史或新闻的，时常串门子，或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共同的语言是文化。《元末东南沿海城市文化特征初探》就是“文化热”的产物了，也可看出“自我”、“个性”等文学人性的概念的运用。因为专业关系，历史的想象与重构倚重于文学文本，如果有什么方向的话，也就是我所谓“文学文化”的意思，更注重以感知形式与情感结构为主的文化史。后来九十年代中在哈佛读书，从事周瘦鹃研究，似是城市文化兴趣的自然延伸，不难在江南文化中找到他的“周家花园”的位置。那也是因为上了李欧梵先生的讨论课，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报刊文化的关系，读了一些有关的理论。其时李先生正在不亦乐乎地研

究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后来成书为《上海摩登》,我也仿佛坐在敞篷船上,与渐涨渐高的“上海热”一起游弋起来。

《“一生低首紫罗兰”——周瘦鹃的“自我再现”与都市镜像》一文是二〇〇〇年参加苏州大学主办的近现代通俗文学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那时在写关于周瘦鹃和民国上海文化的博士论文,此前已经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研讨会上、在亚洲年会上都介绍过周瘦鹃,这次在国内开会特别让我激动,领略到“重写文学史”的令人鼓舞的远景。尤其是范伯群先生对我勉励有加,后来一直在关心着我的周瘦鹃研究。《岂止“消闲”——周瘦鹃与一九二〇年代上海文学公共空间》也是写于二〇〇五年的研讨会论文,以“岂止‘消闲’”为题,是想打破那种民国时期通俗文学无关大雅甚至“媚俗”的成见,探讨其政治功能、读者阶层等理论性问题,以及文学与印刷文化相联系的可能性。有两点须加注意的,一是以“鸳鸯蝴蝶派”(虽然在使用时给打上了引号)来概括民国通俗文学是不够准确的,更合乎实际的周瘦鹃属于“礼拜六派”。二是文章里谈到二十年代末“私人空间”的“消亡”,这一论点在别处也提过。最近因为《从革命到共和》中的几篇文章被译成英文,将被刊出在纽约《当代中国思想》(*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杂志上,担任该专辑的主编钱锁桥兄是研究林语堂的专家,他不同意“消亡”的说法,认为在三四十年代“小家庭”仍在发展。我同意他的批评,虽然提出“消亡”说是针对二十年代末中国社会为党派政治所主宰而言,其实这一观点是需要进一步加以展开和探讨的。

对于周瘦鹃的研究数来也有十余年了,可说是旷日持久,除了常常被其他研究课题拉走,是因为其滚雪球般涉及愈益广阔的人文领域。先是关注周氏的文学创作,后是研究他与政治、电影等方面的关联,这样自然开拓了文化视域,也带来更多的问题。好在现下对于周瘦鹃的专著即将杀青,书中不拟收入这两篇论文,因此收入这本集子里了。

似乎与全球化进程中都市扮演重要角色的理论前设有关,近年来对于晚清与民国时期报纸杂志的研究日见兴旺,事实上已非“上海热”所能涵盖,而遍及北京、天津、广州乃至东亚的都市文化。在国内这方面的学术成果愈益增多,国际上如德国海德堡大学、加拿大约克大学等已成为研究民国通俗文学与印刷文化的重镇,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单就其作为历史资料而言,数量上浩如烟海,对我来说,不光为都市文化瞬息万变的景观所吸引,也面临着研究方法的“历史化”与“跨学科”所带来的挑战,而感到兴奋莫名,逼得要去学习原先不熟悉的方面。报刊研究已经为重写文学史开辟了新的局

面,如小说叙事由“正典”的“全知”观点转向“限知”观点,更具经验、具体与多元的特征。对于报纸杂志大体上说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它们当作材料,能给文学史提供新的角度、新的结论;另一种不仅仅是用作材料,更进而探讨报纸杂志作为传播本体的社会功能,在理论架构上我觉得安德逊的民族“想象共同体”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论述是用得上的,虽然与中国脉络需要一番商略与调适。在这方面我另有几篇论文已收入《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一书中。

范伯群先生提出的“双翼齐飞”说,即近现代文学史由“五四”与“鸳鸯蝴蝶一礼拜六派”所构成,虽在概念上有不同解释,这一提法则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正由于以往的文学史里“他者”被“压抑”得如此彻底,以致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历史的背面”,竟蕴藏着如此巨量的“都市现代性”,如在周瘦鹃那里所看到的,体现了都市大众的多元主体及民主实践、对于本土语言与文化价值的坚持以及某种“公民社会”的诉求,这些历史经验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实践具有内在的联系,是值得大力发掘的民族记忆。

对于范先生所呼吁的“大文学史”,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把茅盾与周瘦鹃作为“革命”与“都市”的不同样本,并思考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是如何能够做到返回历史现场。一个重要途径是摆脱“五四”或“鸳鸯蝴蝶派”这类概念所蕴含的后设的“正典”立场,在一九二〇年代社会思想潮流与印刷资本主义互动的历史语境中来描述他们的文学实践及他们之间的文学争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革命与形式》今年在台湾重版,有机会与淡江大学的吕正惠先生通信讨论,他尖锐提出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如何能适用于中国语境的问题,促使我反思自己的“历史化”方法,该书在都市文化的脉络中探讨矛盾的早期小说时,仍然设定了茅盾作为统一的“革命”主体,不免与“正典”的前设粘皮带骨,这在《论章秋柳——革命与都市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有反映。顺便提及该文在《上海文化》杂志发表后,解志熙君撰文商榷,认为我对“毛戴”一词的诠释牵强附会地“影射毛泽东”。我不反对他的这一理解,如果从“毛戴”一词在最初版本中被打上引号及其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被删除的情况来看,仍存在“影射”或认为被“影射”的可能性。虽然在争论中有点不愉快,但我仍要感谢解君,是他查出“毛戴”在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并不少见的典故,而我却忽视了,这对于贯通古今的要求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新闻传播与民国文化政治”这一辑中的两篇文章都与复旦新闻学院的黄旦兄很有关系。素昧平生,他在某旧书摊上见到拙著《“革命”的现代性》,

遂一见如故。由他的推荐,我于二〇〇七年参加了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李金铨先生举办的“民国知识分子与报刊”的研讨会,递交的论文《共和宪政与家国想象——周瘦鹃与〈申报·自由谈〉,1921—1926》。后来会议论文集在海峡两岸出版,该文也被我自己收入《从革命到共和》一书中。二〇〇九年李先生再次举办研讨会,我的论文《陈冷——民国时期新闻职业与自由独立之精神》似切入新闻史的议题,显得有点冒险,但在会上能得到新闻学专家的批评,使我受益匪浅。今年夏天参加了上海《学术月刊》举办的“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研讨会,也是黄旦兄的介绍。在会上宣读了《拿破仑“三戴绿头巾”——民国初期都市传播文化的女权与民主倾向》,原题目中是“传媒”一词,不如“传播”包含更为舒展的空间,大约是受了他的“传播学”的启发,尽管还一知半解。

“文学与视像现代性”是一门新的研究领域,没有什么能比视觉研究给我带来更多的愉悦与心理补偿。通过《金瓶梅词话》与《夏宜楼》的解读,我深信文学文本中储存了大量的有关视觉的比喻与表述,对于探究民族的感知形式也较为直接,正有待大力开拓。在理论上受了近两三年来国际学界的影响,在哲学思想与文化传统的脉络里把图像作为符号结构来考察视觉话语。《夏宜楼》中关于望远镜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西方视觉中心主义”最早东渐的文学叙事的范本,很大程度上针对目前学界对于西方视觉的在华传播与接受基本上局限在绘画与艺术成品方面,且常常单边强调西方“透视法”的影响。我的研究则试图拓展其疆域,把“视觉性”问题放在文学与文化中加以探讨,且注重这一望远镜是如何在中国的视觉背景中被接受的。与此相衔接,《金瓶梅词话》则展示了在西方视觉装置进入之前“窥视”与“凝视”的本土形态,其文学表现极其深刻而丰富。

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所谓放眼世界,首先在于观点,而大量视觉技术装置,从幻灯、照相到电影接踵而至,在改变国人思维与文化生产等方面作用甚巨。在这一意义上以“西方视觉中心”作为出发点来观察现代中国文艺领域中居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诠释框架,在更为广袤的比较文化的视野中探索文学、美术、戏剧、电影等不同领域是如何呈现同中之异及其互相作用的,由是不得不跨学科而对待文化的整体,来关注集体意识与心态的现代变迁,进而探讨报刊传播的公共功能等重要问题。《电影与脑——主体意识的现代建构》一文谈到,在周瘦鹃等人的言情小说中出现大量有关“脑”的空间与记忆、情绪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直接受到照相与电影的视觉文化的影响,而关于“脑”替代传统的“心”的思维功能则能追

溯到更早自晚明至晚清西方医学、自然科学的输入过程。从晚清到民国的思想话语中,从梁启超到新文化诸子皆独尊“脑”的思维功能,想当然“拿来”外来新名词建构现代思想的武库,而很少在语言层面上对于自身的脑结构及思维预设做什么反思。倒反在不那么自认为精英的周瘦鹃等人那里,展示了现代视觉装置与脑空间的建构,虽属于情绪的本能感受的象征表述,对于现代中国感知系统的历史转型来说富于文化史的意义,且在把视觉技术新名词与古典诗学相融合的表述之中,也寓有在接受西学的同时保持本土传统文化之意,这一点对我们今天也不无启示。

最后一辑的三篇文章是关于语言、诗学与诠释学的,表明一种基于语言本体的文学文化的诠释与批评的立场。在香港科技大学给学生上课,一开始总要讲一些文学的基本原理与解读方法,首先涉及古今之间“视域融合”的原理,藉以建立辩证诠释的观念,同时把语言当作一种物质性的中介,介绍符号、语境、文类等概念,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语言分析能力与批评意识。所谓“诠释学”是关于阅读与理解的学问,早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论中即具萌芽,源远流长的经典注释或疏证传统与政治权力、学术风气紧密联系。这样的诠释传统至宋代发生某种范式的突变,朱熹即为一个重要代表。《朱熹“淫诗”说》一文的开头指出他阅读“淫诗”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经验,似与通常研究新儒家的方式迥异,甚或被认为有唐突之嫌。确实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众所周知,他的“天理”学说对于中国思想的贡献固不待言,但拙文从字里行间的“裂隙”中发现问题,显示某种“解构”的阅读策略,申论这位大儒对于“人欲”的发现及其历史位置。从诠释学角度看,《朱子语类》云:“大抵前圣说话,虽后面便生一个圣人,有未必尽晓他说者。盖他那前圣,是一时间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见而立此说。后来人却未见他当时之事,故不解得一一与之合。”我以为对于经典阅读具有这样明确的历史意识在中国诠释历史中意味着一种新的范式,其物质条件与宋代勃兴的印刷文化有相当的关系,这些问题是值得深究的,只是在论文里略略提到而已。

常常在做了某个个案研究之后,结果引出更多更大的问题,虽然常常萦回脑际,却无法专注。对于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的研究也是如此,《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一文作为“札记”发表,含有留待继续探讨之意。处于历史学为科学主义笼罩的时代,陈先生属力挽狂澜者。他不仅力图破除现代史学专科的局限而重现了文史哲之间的“贯通”传统,也显然意识到中国诠释传统在现代的断裂。他的著名的“今典”说提出了微观历史时

空中“诠释循环”的问题,对于钱、柳诗文及其他文本的交互释证中展开明末清初的历史重构,正是“今典”理论的实践,这对于宏观的“视域融合”之论中所含的当代后设不啻是一种挑战,为我们如何能做到历史“脉络化”及“浓描细写”带来了警觉和启示。陈先生在研究中十分重视文学类型、风格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关系,《柳如是别传》当然蕴含着他在文体方面的自觉,但此书几乎是由考证与笺释所构成,这不光是特定政治环境中的边缘书写,即使从现代中国“语言转折”及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脉络中看,也是有一种表示骨鲠“自我”的一种姿态。这或许出于我的偏爱,《柳如是别传》集抒情传统与现代科学实证于一身,确是部奇书。既是史家的技进乎道的精彩演绎,也是诗人对于现实与文化的勇敢干预;就如何使学问臻于性命的境界来说,我们至今似乎还缺乏这种传承的担当,而《柳如是别传》则提供了一个现代实践的范例。

在中国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中,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化范式,虽然在某些深层并未与传统文化割裂。有一点是特别的,即民族国家在动员语言资源方面可说是史无前例。一九二〇年代初以白话为中心的“语言转向”意味着语言本身被烙上国家意识形态,虽然与印刷资本主义之间形成一定的张力,但“白话政治”在政党与群众运动中发挥了巨大功效,从“大众语”到“普通话”贯穿着一条红线,而文学创作或多或少受到了现代语言意识形态的制约,尤其体现在一九五〇年代之后的现代文学史中,白话成为衡量文学的价值标准,其排斥机制至“文化大革命”达至巅峰,以致白话变成一种僵化的东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语言转向”与九十年代中国全球化》一文指出,在开放时期知识分子对于单边白话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后遗症”进行了反思,相应地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出现了语言的多元选择,而作为知识分子、传媒与国家力量合谋的结果,出现了以“汉语”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凝聚着集体的政治无意识,也是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策略的回应。

最后收入两文作为附录。一篇是读了章培恒先生《不京不海集》的体会,不光是为了纪念,实际上是一次重新学习先生的文学“人性”的襟怀、追求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的机会。另一篇是和李欧梵先生的访谈,涉及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等问题。这个访谈是在一九九四年夏天做的,对于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来说,也是一种启蒙。在提倡和实践跨文化研究方面,李先生是个但开风气者。他开始是学历史的,后来转向文学,又结合文化研究,近些年来游刃于音乐、建筑、电影等领域,人文探索漫无止境。对任何新知,他是那么兴致勃勃,赤诚相从。他不盲从任何理论,却愿意沟通斡旋;他总是怀

疑而虚怀若谷,兴味在于探索之中。在他身上,理论与历史、文学与文化、生活与学问,始终犹如浑然天成。这些方面是学不来的,但先生总叫我走自己的路。

当初兴趣旁涉,误打误中,并非有意“跨界”,却也是学术环境所致。九十年代的北美人文学界崇尚理论,动辄福柯、本雅明、德里达,名校之间争奇斗妍,如杜克大学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哥伦比亚大学萨伊德的“东方主义”、耶鲁大学的“解构主义”以及星罗棋布大小各校的女性主义等,皆领一时风骚,无不以打破学科分际、人文整合为标榜,由是渐成风潮。相对来说哈佛的学风较为保守,不以偏锋巧胜,然而新潮涌动,名家林立,合纵连横,以跨系合聘为荣,力冀释放多元能量。李欧梵先生那时在东亚文明系任教,也与西语系一些教授合作,主持一个跨文化研究小组。有一回把格林布勒特(Stephen Greenblatt)请来演讲,我们都去听了,对东亚系学生可是一件盛事。格氏是美国“新历史主义”一代宗师,哈佛花重金把他从伯克利加州大学挖了过来,这也是重视跨学科研究方向的表征。同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的领头人荷米·巴巴(Homi Bhabha)一向在芝加哥大学称雄,后来也加盟于哈佛,大约也是因为重金礼聘之故。

现下“interdiscipline”即“跨学科”一词在高等院校普遍追逐“国际化”的趋势中几成口头禅,其实我对这个词的注意是在二〇〇二年来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执教之后。人文学部规模不大,教授人数远比不上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教文学的总共不过六七人,但如郑树森先生或已故高辛勇先生皆精通西方文学理论,各另有所专长,兼治世界电影史或中国小说史。人文学部把“跨学科”定为研究方向,这也成为培养研究生的原则。原来科技大学的许多科系都跨学科组合,如“环境学部”、“生物工程学部”等属于重点发展的“跨学科计划”(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受赐于这样的学术空气,我的这些研究课题能得以顺利开展,也常能得到人文社会学院乃至香港教育委员会的研究经费的支持,而且我的研究也受惠于香港高校图书馆的互联系统,其馆际互借如此便利有效,能及时获取西文的参考资料。然而“跨学科”听上去时髦是一回事,人文世界的研究兴趣如果没有感情的导向,则是干枯苍白的。

编罢这本集子,回顾学问的旅程,辛苦而快乐,突然好像觉得走在十字路口,所耕耘的还很有限,有的还只是开了个头,却展示了新的可能与机遇,不由得要慨叹学海无涯而生有涯,然而有所不为有所为,盼望今后能有所突破,更上层楼。

收入的文章除了个别地方作了必要的修订,基本上保持原样。在此谨对贺圣遂兄表示诚挚的感谢,没有他的鼓励和支持,就不会有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另外博士生李德超对发表于八十年代的三篇文章的注释和引文作了校订,《世界革命语境中的中国“革命”》一文由张晖翻译,《“语言转向”与九十年代中国全球化》由林浩东翻译,在此一并致谢。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于香港清水湾

目 录

1 自序

明代文学

- 3 明初政治与吴中诗歌的感伤情调
- 15 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
- 27 试论晚明文学“现代性”——杜丽娘“游园惊梦”新解

“革命”话语与翻译理论

- 43 世界革命语境中的中国“革命”
- 60 孙中山何时自称“革命党”? ——早期思想地图与“革命”指涉的勘探
- 85 辛亥,死活都要“革命”

文学都市与报刊文化

- 99 元末东南沿海城市文化特征初探
- 118 岂止“消闲”——周瘦鹃与一九二〇年代上海文学公共空间
- 135 “一生低首紫罗兰”——周瘦鹃的“自我再现”与都市镜像
- 150 章秋柳:都市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新闻传播与文化政治

- 177 拿破仑“三戴绿头巾”——民国初期都市传播文化的女权与民主倾向
- 203 陈冷:民国时期新闻职业与自由独立之精神

文学与视像现代性

- 237 欲的凝视——《金瓶梅词话》的叙述方法、视觉与性别

2 ■ 古今与跨界——中国文学文化研究

- 265 凝视与窥视——李渔《夏宜楼》与明清视觉文化
289 电影与脑：主体意识的现代建构——以周瘦鹃《红颜知己》为中心

语言、诗学与诠释学

- 305 朱熹“淫诗”说——诗学诠释的“哥白尼革命”
324 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札记
340 九十年代中国“语言转向”和全球化

附录

- 359 追求真理，毋变初衷——章培恒先生《不京不海集》读后
380 文学与文化研究——访谈李欧梵先生